

· 理论研究(教育部名栏) ·

# 构建新发展格局： 历史镜鉴、实践逻辑与突破路径

陈雁<sup>1</sup>，蒋莹<sup>2</sup>，贾根良<sup>3</sup>

(1. 桂林旅游学院 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 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3.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从历史来看，大国的崛起之路，没有哪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国际循环实现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可以从美国的经济史中汲取经验。美国的崛起与美国学派理论密切相关，新李斯特经济学吸收了美国学派的养分，并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可概括为需求牵引、供给支撑、开放互促的闭环机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备工业体系优势和出口大国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李斯特经济学；超大规模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6)02-0018-14

##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步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使中国相当一部分产业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在一段时期内，伴随大量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中国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外需部门和内需部门割裂的特征，进而引致内部需求不足、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为破解上述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美国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镜鉴，而主导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正是后来深刻影响李斯特学术思想的美国学派。

**收稿日期：**2025-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府补贴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逆向选择行为治理研究”（22BJL107）

**作者简介：**陈雁（1982-），女，湖南江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研究。E-mail: 12732511@qq.com

蒋莹（通讯作者）（2001-），女，重庆梁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新经济学研究。E-mail: 2530302556@qq.com

贾根良（1962-），男，河北蠡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财政货币问题研究。E-mail: jgliang97@126.com

英国、美国、德国的崛起分别由重商主义、美国学派、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这三大政治经济学理论引领。李斯特经济学建构了一座围绕国家干预理论、生产力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大厦, 对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的路径和条件作出了重要阐释<sup>[1]</sup>。美国学派并非继承李斯特, 反而是李斯特经济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以汉密尔顿、在美期间的李斯特、凯里等为代表, 美国学派提出了独创性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包括劳动生产率学说、资本能量生产率学说、基础设施理论、金融业的公用事业理论等。

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兴起则是对上述理论的现代重构。塞尔温将张夏准、韦德、阿姆斯特登等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的学说称为新李斯特经济学, 这些学者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 更深刻批判了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比较优势战略, 指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主张该战略本质上是在“踢开梯子”, 意图将后发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sup>[2]</sup>。赖纳特进一步将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等在内的李斯特经济学传统引入演化经济学, 形成了演化视角下的新李斯特主义流派<sup>[3]</sup>。贾根良等将演化发展经济学注入李斯特经济学传统, 开创了中国情境下的新李斯特经济学。相较于李斯特经济学, 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进步在于致力于揭示“国富国穷”背后的深层因果机制。新李斯特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提升本国的生产力, 而非仅仅关注短期贸易收益的交换价值<sup>[4]</sup>。李斯特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 不局限于寻找历史模式, 而是结合技术、制度与政治变迁解决当代问题<sup>[5]</sup>。在承继李斯特国家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实施价值链高端保护战略, 将保护范围从单一的工业扩展至农业、服务、技术、金融等领域。新李斯特经济学结合新时代全球经贸格局演变, 系统阐释了后发国家如何突破依附性发展模式, 实现自主性、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可能。新李斯特经济学不仅为发展中国家重塑内源型发展动能提供了思想支撑, 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了学理基础<sup>[6]</sup>。

在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 新李斯特经济学所倡导的国家能力建设、产业自主和技术主权等核心主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价值。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系统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协同互促的格局, 已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重心。鉴于此, 本文梳理美国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 运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深入剖析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镜鉴、实践逻辑与突破路径, 旨在探索如何通过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 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协同互促, 从而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全球竞争地位提升提供理论镜鉴与政策参考。

##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镜鉴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领先地位的确立可追溯至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关键历史阶段。美国建国后逐渐形成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北方地区深受欧洲工业革命影响, 走上了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迅速推进, 催生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资产阶级, 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快速成长。相比之下, 南方地区则延续了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体系, 依赖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北方地区力图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 以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南方地区则致力于拓展海外市场, 维持农产品出口依赖型路径, 两者在经济制度和发展方向上存在根本性张力。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推进, 南北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爆发内战。凭借更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资源动员能力, 北方战胜了南方,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压倒了奉行自由贸易的农业出口模式。以凯里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指出, 美国应建立高关税壁垒, 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 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提供国内市场, 实现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和内向型经济的自我循环<sup>[7]</sup>。当时美国工业尚处于成长期, 生产成本较高, 难以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与国际竞争者抗衡。因此, 实施关税保护政策成为培育国内高附加值产业、保障其国内市场空间的关键手段。美国学派进一步强

调,通过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市场协同,可以有效抵御外部经济周期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自主可控和均衡发展。

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内需主导型工业化战略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保护主义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美国工业化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引。内需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实质是通过构建内需驱动、部门联动的闭环发展体系,完成从依附性外向经济到自主型内生增长的转型。历史表明,美国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美国学派所构想的理论路径,体现出典型的内向发展特征<sup>[8]</sup>。

19世纪,美国通过采取一系列背离当时主流国际经济原则的政策,包括有意识地规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实现了与全球经济的部分脱嵌。此举旨在重构国内市场体系,推动生产率、利润与工资水平的协同提升,有效保护本土市场和民族工业。在此过程中,美国依托内需主导型工业化战略清除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结构性障碍,为其后续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可以批判性借鉴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经验,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工业、农业与服务业之间形成基于内部交互需求的正向反馈机制,从而实现内生性增长。从理论源流来看,美国学派所倡导的经济思想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维度,二者协同发力方能保障经济体系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从美国的经济史来看,其在维持较高初级产品出口比率和较高制成品进口比率的贸易结构背景下,本土制造业却实现了从较低起点的快速崛起。这一发展路径表明,美国在有效应对外国工业制成品大规模输入压力的同时,其国内制造业仍得以持续积累发展动能并保持增长态势。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在19世纪长期实施的高强度保护性关税政策<sup>[9]</sup>,其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一具有明确产业导向的贸易政策庇护下实现了迅速扩张。保护性关税政策为当时尚处幼稚阶段的美国工业提供了必要的成长空间,使其逐步摆脱了依附地位。

然而,实施单一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足以推动美国工业化的全面深化,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与国内市场充分竞争机制的结合。如果将贸易保护简单等同于没有竞争,则是一种认识误区<sup>[10]</sup>。正如19世纪美国倡导保护主义政策的政治家克莱所强调的:“我们必须赶快让真正的美国政策付诸实施;在将目光盯在海外市场的同时,我们必须开拓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国货在国内市场的占有量;我们必须与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抗,将我们过去对外国工业的支持转移到促进我国国内工业的发展上。”<sup>[11]</sup>由此可见,关税保护并非封闭性政策,而是通过构建内部市场机制提升本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战略性安排。在此意义上,保护性关税政策构成了美国工业与农业之间乃至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的关键制度条件。

美国在19世纪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单一关税政策的实施。关税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有效运行依赖于具备相当规模的市场载体。在美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持续的领土扩张,即通过购置、兼并、殖民等方式将周边土地逐步纳入联邦并设州构成了其国内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一战略不仅使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州扩展为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且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而为美国依托内部循环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条件。

在此背景下,美国所实施的关税保护政策实质上起到了将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保留给本土企业的作用,使其得以规避外部竞争、积累资本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由此,美国走上了一条区别于英国的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随着领土的扩张,美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供给均显著增加,进一步激发了其依托国内大循环推动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因此,关税保护不仅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备政策必要性,也因其与国内市场规模的适配性而具有制度合理性。此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美国丰富的资源禀赋不仅保障了国内初级产品的基本需求,还使其通过出口部分

资源类产品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必要资本。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动员机制进一步巩固了其内需主导型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

随着领土的持续扩张和人口的稳步增长, 美国在 19 世纪积极推进以“内部改善”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该战略重点围绕邮路系统、内河航运、公路网络、铁路建设展开, 逐步构建起覆盖广泛的交通运输与通信体系, 为国内经济循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物流的畅通提供了关键支撑。需要指出的是, “内部改善”作为一项综合性国家战略, 其目标具有多重性。一方面, 它显著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提升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效率, 形成了国内统一大市场<sup>[12]</sup>。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的完善有效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 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并在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3]</sup>。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构建完善的内部市场环境, 美国得以孕育出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高质量经济活动, 从而有效规避了当时外部经济强权对本国产业体系的冲击与制约, 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产业发展道路, 最终在全球竞争中建立起持久优势。

###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短期内的应急安排, 而是一项面向中长期的系统性结构转型战略, 需要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一系列环节, 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特征。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中国已有优势的简单叠加, 而是国民经济循环系统在结构和机制层面的再组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和出口大国优势分别对应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需求侧基础、供给侧支撑和国际循环连接能力。

#### (一)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循环体系, 实现了以追赶型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历程, 逐步建立起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成为具有超大规模产业链的制造大国。然而, 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及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 构成了当前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制约。同时, 近年来,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剧, 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成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成为支撑国内大循环顺畅运行的关键基础, 而完整的内需体系则构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sup>[14]</sup>。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与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 也将推动经济发展朝着更加合理化、高端化、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条件, 大国经济不仅能够形成充足的有效需求, 还可以借助规模经济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分工深化和结构升级。市场规模越大, 越有利于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机制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 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现代化<sup>[15-16]</sup>。因此, 通过构建更高水平的国内动态平衡, 可以充分释放本土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 推动供需结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匹配, 提升国内大循环对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的双向引领能力, 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超大规模市场是指经济体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广阔的国土空间、巨大的经济总量、统一的国内市场四大要素为基础, 通过各类要素叠加与耦合形成的整体性市场体系。马建堂和张军扩<sup>[17]</sup>指出, 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具体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创新学习效应和发展外溢效应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当前, 中国作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特征的经济体, 其结构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 人口规模所内生的超大规模市场禀赋。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 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同时,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中国 15—64 岁人口总数超过 9 亿人, 超过美国、欧盟、日本该年龄段人口之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也提升了其国际分工中的专业化水平和价值链地位, 降低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程度,强化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人口质量红利逐步替代数量红利,为产业结构升级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持续动力。

第二,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且结构不断升级。“十四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保持在全球前列,其持续扩大且呈现结构升级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61万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40.38万亿元,餐饮收入5.22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14.46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82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9%。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品质化升级趋势,服务消费和新兴消费业态增长显著。市场规模扩大不仅激发了消费潜力,也通过需求牵引促进产业链整合与技术创新,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提供了坚实基础<sup>[18]</sup>。

第三,市场主体持续增长与发展活力增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9亿户。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年新设经营主体2737万户,日均新设企业2.4万户。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主体作为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载体的作用日益凸显。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在促进就业、推动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力量。

综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体现为要素规模的静态优势,更在人口结构、消费升级和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形成动态、系统的发展韧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基础。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提高,中国国内需求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对高技术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显著增长并呈现刚性特征。为适应国内外竞争环境和需求结构的动态演变,中国产业体系正处于系统性升级进程中,以提升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之间的适配性。超大规模市场构成了少数工业大国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居民消费与产业投资、消费品市场与投资品市场在规模持续扩大和能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对技术复杂度更高、质量更高、性能更强的产品形成了强劲引致需求,从而为中国工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国内市场支撑<sup>[19]</sup>。中国具备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且处于持续升级过程中的国内市场,这一优势有助于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推动消费持续提质扩容,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动力结构,进而有效缓解国际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十四五”期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6.2%,比“十三五”期间提高8.6个百分点,充分发挥了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从边际变化看,消费增速在经历阶段性修复后逐步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而11月当月同比仅增长1.3%。这表明消费复苏态势仍较为温和,需求端制约因素尚未完全消除。近年来,尽管消费在统计层面保持温和增长,但增速与预期存在偏离,反映出居民需求仍受收入预期、分配结构和流通效率等多重因素制约。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约束、被抑制的状态,供求不匹配、分配不平衡、流通环节存在阻滞等因素削弱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强化功能,导致市场规模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内需体系优势<sup>[20]</sup>。

展望未来,应继续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专业化分工、集聚高端生产要素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激活国内巨大消费场所蕴含的发展红利。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国内市场的规模与结构潜力,并依托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协同性和联动效能。

## (二) 充分发挥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既包括由最终消费需求带动的循环,还包括由供给能力驱动的产业链循环<sup>[21]</sup>。超大规模市场所具备的需求引致创新和成本分摊机制,可为本土制造业提供加速技术迭代和保护幼稚产业的成长屏障<sup>[22]</sup>。但是,要将市场需求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仍需以门类齐

全、配套充分、可持续升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作为核心支撑。

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命脉，是推动一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石。构建安全、可控、有韧性、以内为主的经济体系是大国崛起的关键<sup>[23]</sup>，英国曾因过度依赖国际循环而忽视本土工业升级，最终丧失世界工厂地位<sup>[24]</sup>。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工业体系尚不健全。经过七十余年的系统建设和持续积累，中国工业体系已实现历史性跨越和结构性变迁。传统工业领域如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建筑材料、医药持续发展壮大，并实现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同时，一批新兴工业领域，包括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实现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跨越式发展。在若干关键技术与装备领域，中国已进入全球前列，如移动通信、语音识别、隧道掘进装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集成电路制造、高端数控机床、大型船舶装备等方面也正加速技术追赶，逐步缩小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更值得一提的是，五轴联动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重大技术装备的成功研制，有效弥补了国内关键装备的多项空白，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从产业规模来看，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持续跃升，工业增加值已从建国初期不足百亿元，持续攀升至2024年的40.5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自2010年起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至今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这一完备且具有韧性的工业体系，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系统支撑。

中国工业在规模体量和体系结构上均呈现显著优势。根据联合国对全球工业产业的划分标准，中国工业已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球工业门类最为齐全、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这一结构性优势意味着，即便在外部环境发生波动或冲击的情况下，国内产业体系也能迅速实现关键产品和中间投入的替代，从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在生产环节，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为构建高效、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工业生产增势较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充分体现了工业生产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具体到行业层面，超过八成工业行业实现增长，产品种类的覆盖面扩大，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为经济内循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分配环节，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主体，其营业收入、劳动者报酬和利润的增长共同构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关键支撑。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4年，其增加值增速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展现出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态势。同时，消费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凸显，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持续增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稳定在较高水平，反映出供需适配性和流通效率不断提升。

中国工业供给体系在规模、结构和效能上的系统性提升，已显著缓解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发展的工业品短缺问题，推动市场供求关系由紧张匮乏转向富足充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依据和物质保障。

但是，从循环畅通的角度来看，供给体系的完备并不必然带来资本的同步扩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44万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1%、房地产业投资同比下降10.8%。同时，投资结构呈现明显分化：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2.0%，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2%。这表明投资偏弱更多体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链条收缩和民间部门预期偏弱叠加下的结构性放缓，而非工业体系整体性的供给过剩。

完备的工业体系不仅有助于在工业经济内部构建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还能够显著压缩工业配套环节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形成具有显著性价比优势的产品竞争力。这种成本优势提升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进而在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中提升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完备的工业体系被视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结构性

条件。当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融入市场运行,其内在的“迂回生产”特性会通过乘数效应激发对中间产品和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出关键的内生性需求条件。在此过程中,由需求引致的技术追赶压力促使设备工业逐步摆脱对引进技术的路径依赖,转而通过自主技术开发占据市场,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有效降低了工业部门的投资门槛和再生产成本。进一步地,持续升级的高层次需求和不断提升的投资能力,共同推动高技术产业实现广泛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最终促进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sup>[25]</sup>。从理论逻辑来看,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性,涵盖了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与生产规模之间的正向循环机制,这一自我强化的反馈过程构成了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源泉。

完备的工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和制度基础。从纵向维度来看,社会再生产过程涵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这些环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为条件、相互牵引,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从横向维度来看,不同产业门类、经济部门、区域单元之间,通过有序的专业分工和高效协作,形成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布局网络,共同构筑起一个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结构匹配的立体化国民经济循环架构。当前,应立足于新发展格局所涉及的重大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空间布局要求,着力破解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结构性梗阻和制度性障碍,打通生产到消费全链条的堵点淤点难点,推动社会再生产过程更多依托并服务于国内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从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sup>[26]</sup>。在此意义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实现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模式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模式转变,以此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全面实施<sup>[27]</sup>。

### (三) 充分发挥出口大国优势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互依托、协同互促。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上,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联通<sup>[28]</sup>。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面对当前中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互促性不足的现实,必须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动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sup>[29]</sup>。

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的比重持续居于世界首位,并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规模达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在出口结构方面,机电产品作为出口主导品类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24年,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9.4%。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势显著,电动汽车、集成电路、船舶等重点领域表现突出,这反映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升级成效显著。此外,贸易方式和市场结构也呈现积极变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实现稳步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4%,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9.6%、2.7%。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190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新兴、传统市场同时增长,这反映出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动出口贸易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升,有助于深度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循环空间,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全球资源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中国紧缺的战略性资源、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研发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弥补国内相关领域供给能力的不足,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还能更好地响应消费结构升级和内需扩大的趋势。此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体制,并在制度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1—11月,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4.46万亿元,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6.75万亿元,贸易顺差7.71万亿元,凸显中国出口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现象也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进口需求偏弱、国内需求恢复不充分的现实。如果国内需求体系与投资—消费循环的内生动力不足，外循环就会被动承担更多稳增长功能，从而弱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取向。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市场格局、需求结构和制度安排正经历深刻变革。面对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等多重挑战，中国亟须改变对部分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过高的现状，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以提升外部风险抵御能力。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优化贸易商品结构，着力培育和发展高质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以强化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核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视角来看，国际分工形态已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逐步深化为产品内分工。在这一新型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由最终制成品逐步转向中间品。由此，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多寡不再仅仅取决于其进出口规模，而更关键地取决于本国企业在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分工地位。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企业和国家往往能够获取更高附加值，而处于低端环节的企业和国家则收益有限。因此，中国要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嵌入，必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稳步推动产业与贸易结构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路径在于加快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为巩固贸易大国地位、迈向贸易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新发展格局不是内向封闭的静态单循环，而是一种以开放、主动、变革为特征的双向互动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为国际循环注入持续动力，更在内外双向联动中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形成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从而为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sup>[30]</sup>。在这一框架下，出口贸易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升对于提升中国出口质量具有关键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虽未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溢出效应，但具有明显的结构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正面临深刻重构，其演进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内需市场的持续扩大和高度开放，将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增强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不仅有助于抑制外资产业链的对外转移倾向，还将持续吸引外资流入，从而在新发展格局中夯实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

综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可概括为需求牵引、供给支撑、开放互促的闭环机制。其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需求规模和创新试错空间，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保障供给弹性和配套能力，出口大国优势则体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协调互促的通道支撑和竞争优势。这三大优势在过去较长时期主要服务于国际大循环战略，但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未完全打通<sup>[31]</sup>。现有优势并非必然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从新李斯特经济学强调的能力建设视角出发，唯有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内部改善”、制度型开放方面实现突破，才能切实将其转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动力。

##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路径

### （一）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增加值的比重约为30%，在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大多数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从价值创造和核心技术掌控力来看，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创造能力仍相对薄弱。作为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关键源泉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工业和制造业的高端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长期竞争力。核心技术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及其所建构的高进入壁垒，共同塑造了高附加值、高质量生产活动，进而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发达国家致富的重要路径在于进口中低端产品和出口中高端产品，这深刻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规律。

近年来,虽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方面发展迅速,但依然面临核心技术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大部分产业的贸易结构仍呈现高端环节失守、低端产能过剩<sup>[32]</sup>的特征。为扭转这一局面,亟须采取系统性策略。一方面,重点保护那些科技创新机会窗口显著、具备报酬递增特征的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国内为其营造统一、开放、有序的超大规模市场。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以高附加值环节为核心的本土价值链,着力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育领先市场,并在此过程中强化智力资源的引进和内生积累,逐步减少对单一外部资本和技术的依赖。

唯有在各主要产业中确立并巩固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国内各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和平衡增长,才能真正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也将使经济发展逐步摆脱对特定外部市场尤其是单一国家市场的依赖,从而筑牢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应着力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显著降低国内流通与运输成本,促进商品和要素的高效配置。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多元化、高层次的国内分工体系,在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加快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具有自主可控能力的国内价值链。这意味着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应在关键技术领域推动形成以本土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有效竞争格局,从而为应对外部竞争奠定坚实的产业组织基础。

进一步而言,需推动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促进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之间的结构平衡,强化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具备较强韧性和独立性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李斯特的贸易发展理论具有重要启示:一国从贸易中获益的关键越来越取决于其所处环节及附加值获取能力。为此,贸易结构调整应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跃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支撑发展方式转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并非单纯的数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应以能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判断标准。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带动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交换价值的增长,为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比较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一过程也呈现规模扩张较快、质量跃升不足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高技术不高”的结构性困境,即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并未同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控。由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倾向于依赖外资和技术引进,弱化了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而陷入“低端锁定”和产业链依赖。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可能因自主创新周期长、风险高而减缓技术追赶速度,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技术交流与扩散。然而从长期动态视角审视,国内大循环能够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市场需求倒逼机制激发自主创新活力。在此过程中,企业将逐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致力于补齐产业链关键短板,最终提升产业链的自主性、完整性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 (二) 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突破路径之一,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度融合,对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支撑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历史经验来看,“内部改善”是后发国家培育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崛起的重要基础。克莱最早提出“内部改善”的概念,主张以公共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市场运行效率,这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得到验证<sup>[33]</sup>。李斯特进一步从国家经济学视角强调,内部市场整合和基础设施完善是形成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在当前中国情境下,“内部改善”被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包括铁路、公路、航运等传统物理网络,更涵盖以数据为核心、以网络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驱动的新

型基础设施。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核心在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分割<sup>[34]</sup>。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功能形态正发生深刻转变。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在要素形态、运行机制、经济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传统基础设施主要依赖有形实体网络,构成产业发展的物理前提。新型基础设施则以数字空间为载体,依托数据流动和算力协同,深刻重塑资源配置模式和发展空间结构,为提升经济运行效能提供了新的国家—市场协作界面。尤其在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突破地理局限,促进西部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对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不确定、商业模式不成熟等特征,不宜采取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推进模式。各地应结合区域产业结构、技术积累、人才资源等条件,科学界定各类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建设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形成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在制约中国国内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中,东西部资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已成为显著短板。尤其是在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际,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二十周年。长期以来,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及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赖纳特<sup>[35]</sup>指出,一国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着力发展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推动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农业主导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细化的劳动分工和崭新的社会架构。借鉴这一理念,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应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培育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高附加值产业,推动形成国内区域间的水平分工体系,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这要求构建一个涵盖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升级和政策引导的多维支撑框架,引导产业模式实现战略转型,注重人文发展、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成长等内生能力的系统培育。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不仅是推动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的关键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通过将西部打造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和连接枢纽,有助于在空间上优化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在“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应置于国家战略全局中统筹推进,强化西部地区在国内循环中的功能定位,并通过结构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从而实现区域发展质量的整体跃升。

### (三) 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无论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是赋能新型基础设施,最终都受制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力。当前,随着产业技术复杂度的系统性提升,单一企业或创新主体已难以独立承担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任务<sup>[36]</sup>。中国产业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快速突破,必须同步构建高效的产业化能力和前沿创新能力。然而,在既有的产业技术政策框架下,仅通过局部调整与修补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因而迫切需要推动产业政策体系的深层变革。在此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作为顺应国家战略需求、融合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的科技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的科技治理模式,其能够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多重挑战。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顶层制度设计,系统动员和配置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要素,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能动性的有机结合。其核心在于构建一套组织重大科技攻关、突破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重大专项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与突破提供制度保障。这一体制不仅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协调,也激发了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关键支撑。

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强化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支撑。在这一导向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需统筹计划式直线管理的组织优势和扁平化管理的活力激发功能，通过强化政府的组织协调与统一管理职能，创新研发活动的组织模式，建立健全共性技术研发成果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分享机制，实现多主体激励相容。政府部门应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引导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成熟产品并实现规模化应用，以此检验并兑现技术的经济社会价值。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速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贯通科技创新链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系统构筑面向未来的竞争新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68%，规模居世界前列，但在投入结构、配置效率和原始创新能力等方面，与科技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对前沿突破和原始创新的制度支撑，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迭代应用，营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推广和应用的生态系统，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推产业体系全面升级。

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创新是衔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关键环节，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其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其利润导向行为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路径之一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以确保共性技术研发核心目标的实现，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创新行动协同一致，通过科学的成本收益共享机制，构建开放融合、持续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 五、进一步讨论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战略并非无源之水，其深层理论逻辑可以在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脉络中寻得坚实支撑。回溯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历程，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提供了经典范本。李斯特指出，一国生产力的长远发展，不能依赖于静态比较优势下的初级产品出口，而必须通过有针对性的关税保护和国家干预，培育本国先进的“生产力资本”，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生产资料工业），最终实现产业独立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一理论为理解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寻求自主发展的战略转向提供了关键的历史镜鉴。

然而，直接将19世纪的保护主义教条移植于21世纪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无疑是一种理论误读。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核心课题已不是简单的产业有无问题，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如何突破产业低端锁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因此，对李斯特思想的借鉴，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升级，这正是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时代使命。它超越了传统保护主义对国境的狭隘关注，转而强调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国内市场整合和科技创新驱动，系统性重塑一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确保经济安全与竞争力提升的辩证统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这一理论逻辑在中国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和战略展开。

首先，从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出发，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在于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产业壁垒。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本质是技术链和创新链的竞争。改变内需结构层次偏低、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的失衡局面，必须将获取资本货物工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主导权作为核心目标。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补链”“强链”，更要“创链”。国家需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发挥组织者作用，整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资源，形

成“需求牵引、战略导向、市场转化”的崭新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市场机制将创新成果大规模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才能驱动国内产业升级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从根本上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安全性、韧性,避免在深度开放中丧失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在于通过空间战略重组和市场深度一体化,释放超大规模内需潜力。李斯特深刻认识到国内统一市场对培育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制约国内循环畅通的突出矛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国内段的协同推进,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国家经济地理的重塑。其核心在于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引导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端制造产能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在全国范围内构建更加均衡、高效的区域分工与贸易体系。这不仅化解工业过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结构性风险,更能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激活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本土高端产业提供赖以成长、迭代与降本广阔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在夯实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同时,新发展格局绝非走向封闭,而是追求更高水平、更具选择性和战略主动性的对外开放。新李斯特经济学框架下的开放是服务于国家生产力升级战略的开放,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具有战略必要性的领域,与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开展竞争性合作,以我为主,吸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更具长远战略意义的是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合作。随着国内产业升级,部分优势产能和中间产品可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梯度转移。同时,将中国日益成熟的高端装备、数字化解决方案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不仅能为中国升级后的产能开拓新的市场空间,缓解国内结构性过剩压力,更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构建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伙伴网络,形成技术链、创新链、人才链、就业链的“共生共荣”。这种基于能力互补与发展阶段衔接的国际循环,促进了共同发展,也提升了中国价值链的韧性和影响力。

当前,世界面临全球化进程深刻调整和逆向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挑战。这一历史性变局迫使我们对中国发展路径进行再反思。许多国家奉行的单纯外向型或进口替代战略,在全球化红利减退的今天暴露出其局限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历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表明,大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找到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最佳平衡点。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这一历史命题的当代回应。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从嵌入、适应全球价值链转向依托自身优势塑造全球价值链的新阶段。

以新李斯特经济学为理论透镜加以审视,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条契合发展中大国崛起一般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和中国智慧的工业化新路。其内在机理在于:以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部整合与升级为战略根基,以基于能力构建的自主性开放为关键支撑,系统性地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价值链依附向价值链主导转型。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不仅将引领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能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新阶段探索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工业化道路,提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重塑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世界经济格局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入这一战略的微观机制、制度保障和动态评估,持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 参考文献:

- [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邱伟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00.
- [2] SELWYN B. A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aisal of Friedrich List and his modern-day followers [J]. *Newpolitical economy*, 2009, 14(2): 157-180.

- [3] 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1.
- [4] 刘乐易,曹越洋,蔡继明.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双重误解——评新结构经济学与新李斯特经济学之争[J].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3):52-82.
- [5]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倪延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
- [6] 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J].教学与研究,2015(3):6-17.
- [7]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贾根良,马学亮,邓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
- [8] 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1(3):101-113.
- [9] 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第二阶段关税思想研究[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1):160-172.
- [10] 贾根良,黄阳华.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5):47-53.
- [11]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革命中的成功者[M].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46.
- [12] 伍山林.中国双循环发展:以全球性大国为镜鉴[J].求索,2021(5):136-144.
- [13] 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11-125+222-223.
- [14] 董志勇.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9(1):128-136.
- [15] 张海丰,黄晨,周建波.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及其辩证利用[J].财经问题研究,2024(8):22-33.
- [16] 欧阳晓,汤凌霄.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J].经济研究,2017,52(9):11-23.
- [17] 马建堂,张军扩.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J].管理世界,2020,36(1):1-7+44+229.
- [18] 许德友.以内需市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基于市场规模的视角[J].学术研究,2015(5):92-98.
- [19] 史丹.“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2):5-27.
- [20] 徐奇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J].金融论坛,2020,25(9):3-9.
- [21] 洪银兴,杨玉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J].经济学家,2021(3):5-14.
- [22] 桂河清,孙豪,武优勤.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及其发挥[J].财经问题研究,2025(8):100-115.
- [23] 刘元春.刘元春: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20(10):30-33.
- [24] 高策,祁峰.构建新发展格局:历史演变、现实逻辑、卡点瓶颈及实践路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3):17-26.
- [25] 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22(1):36-62+204-205.
- [26] 鲁保林,王朝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经济学家,2021(1):15-23.
- [27] 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1,56(4):4-23.
- [28] 黎峰.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J].财经研究,2021,47(4):4-18.
- [29] 李福岩,李月男.构建新发展格局:生成逻辑、核心内容与战略意义[J].经济学家,2022(4):28-36.
- [30] 王维平,牛新星.试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J].经济学家,2021(6):5-12.
- [31] 张磊,黄世玉.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3):74-84.
- [32] 贾根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与中西部大开发[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6):103-113.
- [33] 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和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23.
- [34] 刘志彪.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分析框架、内在逻辑与政策重点[J].经济研究,2025,60(5):20-36.
- [35] 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M].杨虎涛,陈国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97.
- [36] 白俊红,孙晋云.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海学刊,2024(1):93-99.

## Construc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Historical Lessons,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ways to Breakthrough

CHEN Yan<sup>1</sup>, JIANG Ying<sup>2</sup>, JIA Genliang<sup>3</sup>

(1. School of Business,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In the face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decision to 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which takes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s the mainstay while allow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to reinforce each other, marks a major strategic shift in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paradigm constitutes a systemic proces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hich requires deepening reform and pursuing high-standard opening-up to facilitate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dependent development model toward an autonomous growth.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Neo-Listian Economics,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and revisit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US's rise in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an inward-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ractical logic underpinning China's efforts and argues that three advantages provide solid support and a realistic foundation: the super-large-scale market, a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status of a major exporting country. At present, China has made notable progress in advan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yet it continues to confront multipl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These are manifested primarily in: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key core technologies, long-term industrial lock-in at the low-to-middle segmen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mbalanc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factor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regional disparities imped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cycle; an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volati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impose persistent shocks on the secur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pathways for breakthrough. First, it advocates building a high-end value chain centered on China's capabilities. Through indigenous breakthroughs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China can advance its industries toward the middle and high end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Second, it call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ing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leverag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reconfigure resource allocation, China can reduce market segmentation,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rd, it emphasizes harness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type whole-nation system" to drive innovation-led development. By coordinating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with the dynamism of market mechanisms, China can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high-end segment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orge new source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lineage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clarifies its genesi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and proposes systematic directions for futur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breakthroughs in response to constraints. These insights can help China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offering a China-based approach for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seeking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the new development dynamic; dual circulation; Neo-Listian Economics; super-large-scale market

(责任编辑: 孙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2.002

[引用格式]陈雁, 蒋莹, 贾根良. 构建新发展格局: 历史镜鉴、实践逻辑与突破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6(2): 18-31.